費雲文：　戴雨農與忠義救國軍

「文化大革命」時期，禁演所有的國劇；代之以江青所認可的「樣版戲」。所謂「樣版戲」，是利用國劇舊有的形式，予以「現代化」的改變；再在內容上套進一些合乎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，而被稱爲「革命現代京劇」的戲。因爲有一種典型的作用，所以叫做「樣版」；後來推廣表達的形式到芭蕾舞劇（如紅色娘子軍）、泥塑（如收租記），成爲「無產階級文藝的樣版」。

「樣版戲」中，有一齣「沙家濱」，描寫抗日戰爭時期，新四軍在江蘇常熟縣沙家濱，爲保護傷兵而偷襲忠義救國軍司令部，並且指忠義救國軍投靠日敵；因爲共黨黨員、地下聯絡員阿慶嫂的情報，終於將忠義救國軍消滅。劇中不但通過「忠義救國軍司令胡傳葵等形象，以「汪」、「蔣」並稱，傳播「國民黨勾結日軍」；而且還通過「沙奶奶」之口詆忠義救國軍：

「八一三，日寇在上海打了仗

江南國土都淪亡，

屍骨成山鮮血蕩，

滿目焦土遍地火光，

新四軍，共產黨，來把敵抗，

歷盡艱辛，東進江南，深入敵後，

解放集鎮有村莊。

百姓才見天日光。

你們號稱『忠義救國軍』，

爲什麼見日寇不發一槍?

我問你救的是那一國?

爲什麼不救中國助東洋?

爲什麼專門襲擊共產黨?

你忠在那裏? 義在何方?

你們是漢奸走狗賣國賊，

少廉恥，喪盡天良！」

「沙家濱」在大陸各地演出，被選爲「優秀樣版」；還攝製成電視記錄片，自 1971 年元旦起，推出上映，並且還加印字幕。

然而，忠義救國軍究竟是怎樣的部隊? 眞 的「聯日」不抗日嗎?筆者覺得應當就所瞭解的眞 實的史蹟，對廣大的社會讀者，作简明而確切的敍述以正視聽!

忠義救國軍成立經過與其性質

抗戰爆發後，民國廿六年八月十三日，日敵進攻淞滬。軍統局的負責人戴雨農先生，爲了發動地方的人力物力，協助國軍抗戰；聯合上海士紳，呈准軍委會，組織「蘇浙行動委員會」和「別動隊」，担任對敵軍突擊破壞工作；由地方團隊及愛國青年志士志愿參加，軍統局的情報行動人員爲骨幹。

蘇浙行動委員會的委員爲吳铁城、俞鸿鈞、杜月笙、貝祖貽、錢新之、劉志陸、吉章簡、蔡勁軍、俞作伯及戴雨農先生；由戴先生兼書記長，負實際責任。別動隊有五個支隊及一個特務大隊；第一、二、三支隊由上海愛國志士和勞工組成，前四支隊和特務大隊由京滬一帶的情報工作人員組成，第五支隊由上海曾受國民軍事訓練的热血青年，以及高中以上學生軍訓總隊全體官生組成。由劉志陸任指揮，陸京士、張業、陶一珊等任支隊長；共官兵一萬零八百餘人，分佈於滬西、浦東、與蘇州河一帶，經常以突擊破壞手段，襲擊敵人，協助國軍作戰。又爲集中官兵思想，養成官兵情報、作戰、行動、破壞等技術，特在青浦與松江成立訓練班，在佘山成立教導團，輪流調訓官兵。

當上海保衛戰第二階段結束，國軍轉進蘇州河南岸，繼續抵抗時；別動隊第四支隊張業部，奉命由滬西挺進蘇州河北岸，佔領戰場要點，掩護國軍撤退；敵前渡波，奮勇殺敵，全部壯烈成仁。國軍撤守時，第五支隊陶一珊部和二、三兩支隊的一部，協助國軍守南市，担任南市到徐家匯之間的守備，掩護國軍主力轉移陣地，苦戰三日；任務達成後，全部化整爲零，潛伏京滬地區，繼續從事抗敵活動。第一支隊，則在浦東國軍撤去後，建立游擊基地，誓死與敵週旋。其餘特務大隊，以及青浦、松江訓練班，佘山教導團，全體官生約一千七百人，由俞作伯率領，退到安徽的祁門縣的歷口鎮，從事整訓。

別動隊係新成立的游擊隊，時简短暫，訓練不够，所使用的武器爲短槍和手榴彈；而遽當大敵，遽負重任，危難困苦是必然之事；戴先生爲激發士氣，躬親督陣。當時，在南京的戴先生部屬徐亮，曾經去電婉勸其應以自身所負重大責任爲重，不必爲此一隅的戰鬥，長此滯留前方，親冒矢石。戴先生慨然答復：

「別動隊起自民間義從，草创伊始，而遽當大敵；無薪餉之奉，官爵之榮；所憑以犧牲奮鬥者，忠義精神也。當以身先爲倡，庶乎能穩固根基，發揚光大，豈可臨危他去？」

並且令徐亮也到上海，共赴艱難；他自己撐持到最後，才離開上海，繞道香港，返回 南京（徐到上海，上海已快淪陷）。

民國廿七年一月，原來在浦東的別動隊第一支隊的雷忠大隊，經奉化撤至遂安；另外戴先生的部屬，在江山辦了一所游擊幹部訊練班，在東陽的巍山，組成一支「浙東支隊」的游擊隊。於是，戴先生呈准軍委會，將安徽歷口和浙江東陽、江山兩地的游擊隊和幹部同志，統一編成「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教導團」。歷口的爲第一團，浙江的合編爲第二團。戴先生兼任總團長，俞作伯爲副總團長，負實際責任。

同年三月十三日，戴先生奉到軍委會的命令，「收容整編流散浦東及京温、滬杭沿線的國軍，加强敵後遊擊工作」；於是指派得力幹部，深入敵後，配合留置敵後的別動隊，積極活動。在阮清源、鲍步超、和管容德等人策劃號召之下，迄四月底，已編成五個支隊，一個直屬大隊，一個南京行動總隊；連同教導第一、二兩團（後來改爲第一、二支隊），總人數有一萬餘人。因於當年五月，呈准軍委會，將別動隊改爲忠義救國軍，設總指揮部於漢口，最先由戴先生兼任總指揮，後來由副總指揮俞作伯繼任，徐光英任參謀長（十二月由尚望繼任），並且將總指揮部推進到浙江的孝豐。

民國廿八年，爲加强京滬和浦東方面部隊的掌握與指揮作戰，於三月一日成立忠義救國軍的淞滬指揮部於上海；派楊蔚爲指揮官，並兼任忠義救國軍的副總指揮，徐志道爲參謀長。迄廿九年春，由於各方面發展迅速，加以部份偽軍的反正；忠義救國軍已擴編爲四個縱隊及一個南京行動總隊，共轄廿六個大隊和兩個直屬大隊，總兵力達二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人：；佈於浦東、上海、及京滬、滬杭鐵路，京杭國道公路一帶。不斷打擊敵人，破壞敵軍的交通倉儲。

盤據京滬等地的日敵，鑒於忠救軍在其腹地的發展神速，聲勢浩大；以致被迫龜縮到城鎮據點之內，行動頗爲困難。爲了解除此種威脅，乃經常抽調兵力，對忠救軍實施掃蕩性的攻擊。

當時，共黨也在江南成立了「新四軍」；還有一支名爲「江南抗日義勇軍」的游擊隊，總指揮爲梅光迪；在江陰、武進等地，，伺機偷襲忠救軍，甚至利用敵軍進攻的時機，乘危夾擊忠救軍，以達到他消滅友軍，壯大自己的目的。

忠救軍處此兩面作戰的情況之下，由於全體官兵的英勇奮鬥，和得到當地民衆的熱烈支持；所以能屹立不搖，免於覆滅之危。其間作戰多次，對敵軍的戰鬥，以浦東之戰最爲慘烈，我第八支隊長馬柏生重傷，所部幾全軍覆没；高淳之役，區隊長向勇陣亡，立屍不倒，最爲偉壯；陸塘之役，斃敵百餘，戰果最大；而最艱苦最複雜的，莫過於被敵軍和共軍夾擊的安鎮之役。

安鎮之役，是民國廿八年十二月上旬開始的，盤據於江陰、常熟、無錫、武進等地的敵軍，增加兵力，在空軍的偵察和掩護下，對正在該地區的我忠義救國軍的五個支隊，以威力搜索的手段，從各方面分頭前進，向內線集中，企圖形成包圍，一舉消滅。忠救軍淞滬指揮部爲應付此一戰局，避免太過集中；乃以駐在無錫至常熟之間的安鎮附近的第二支隊爲中心，作爲吸引敵軍的釣餌，其餘各支隊調駐於較遠之待機位置，準備於敵軍進攻第二支隊時，突然回師，反包圍敵軍，內應外合，一舉殲敵。

當安鎮附近的第二支隊正準備迎戰日軍之時，十二月廿日夜，共黨的新四軍陳毅部，却以四個團的兵力，出其不意的向第二支隊包圍猛襲。第二支隊奮勇抵抗，激戰一日，因爲係對三倍以上的共軍搏鬥，彈藥已消耗百分之七十；而共軍攻勢仍持續不衰，以致情勢相當危急。

廿一日晚，淞滬指揮官楊蔚和參謀處長郭履洲，率領第十支隊和第五支隊的一部，由無錫東北的長涇，自北向南援救第二支隊；但却被陳毅以圍點打援的戰法，阻擊於安鎮以北的膠山，戰況激烈。於是，急令駐於長涇西南的第五支隊的另一部，由西向東，作衝擊共軍側翼的態勢，並且揚言後面尚有實力强大的後續部隊第一支隊。共軍困惑之餘，再分兵向西，迎戰第五支隊，被圍困於安鎮附近的第二支隊，乃把握戰機，乘勢突圍。

廿二日拂曉，盤據於安鎮和羊尖兩地的敵軍發起攻擊；共軍不戰逃竄。我被阻於膠山的第十支隊和第五支隊的一部首當其衝，遂被包圍；因係大戰共軍之餘，戰力疲弊，相當危急，幸而自安鎮附近突圍的第二支隊，正向北方的頭山前進；奉命趕來夾擊敵軍，才化險爲夷，安然脫離戰鬥。

此役，忠救軍傷亡二百五十人，敵軍傷亡卅餘人。匪軍不打日敵專打友軍已經開始；而忠救軍在大敵當前應付爲難的緊急狀況下，設計好的破敵陷阱，却因爲遽然遭受共軍意外的襲擊，而化爲泡影，反而被敵所制；如非該軍的堅定沉着，有忠義精神，早已被解決了。

忠救軍在敵後苦戰兩年，損失雖大，可是由於民衆的踴躍響應，補充也快；但也難免份子複雜，訓練不精。戴先生有鑒於此，乃下令全軍，於民國廿九年三月，集中孝豐，汰弱留强，縮編整訓；編爲三個支隊（又名教導團，按步兵團的編裝辦理）、一個南京行動總隊、一個淞滬行動總隊（總隊人數爲七百人）、一個特務大隊和一個軍官訓練隊。以周偉龍接任總指揮，王春暉、李穰、阮清源爲支隊長；編餘官兵，全部交由第三戰區處理。遷總指揮部於安徽的廣德。

十一月，適新的編組大致就緒，正加强訓練之時；盤據於長興的敵軍，以密匿行動，偷襲廣德，一舉陷城。我第一支隊支隊長王春暉，驍勇善戰；不慌不忙的固守南郊，連夜部署反攻。第二天拂曉，身先士卒，出敵不意的一舉登城，敵軍受創駭退，損失慘重。

王春暉的英勇胆識，被人赞譽爲「王老虎」。戴先生知道之後，頗爲激賞，保送他到後方的中央軍校高級班受訓；而以郭墨濤接任支隊長。

民國卅年一月，整訓完畢，分四路重回 京滬淪陷區，繼續游擊日敵。第一路「蘇嘉滬區挺進縱隊」，第三支隊阮清源部及淞滬行動總隊爲骨幹，由孝豐附近向太湖以東的蘇州、嘉興與上海之間的地區挺進；第二路「澄錫虞區挺進縱隊」，以第一支隊郭墨濤（九月以後. 汪浩然接任）部爲骨幹，由孝豐向陽澄湖、常熟、崑山之間的地區挺進；第三路「錫武宜區挺進縱隊」，以第二支隊文德部爲骨幹，由廣德沿太湖西岸，向宜興、無錫、常州、江陰之間的地區挺進；第四路「京丹溧區挺進縱隊」，以南京行動總隊爲骨幹，进出南京、江舖、丹陽等地。

同時向京滬陷區挺進的四路忠救軍，都遭到敵軍和共軍的攔截攻擊，其中以第一路發展较快，但遭受的打擊也最大；第二、三路則被共軍夾擊最艱苦，激戰最烈。

第一路自是年二月至五月，力戰四月，克服青浦縣的金澤，和章塘，建立堅强的游擊基地；第三支隊所屬的四個營，都擴編爲支隊，淞滬行動總隊的中隊，都擴編爲營（共四個營），並且收縮地方部隊二千七百人，編成抗敌自衛總隊，一時聲勢浩大，敵軍頗受威脅。民國卅一年二月，日敵乃抽調江蘇、浙江兩省兵力達三個旅團，由一中將指揮，以陸海（小砲艇）空軍聯合，對游擊區掃蕩。採用「分區圍困」的戰法和「見人即殺」的手段，逐漸縮小包圍圈；該軍被迫與敵軍決戰，延續達廿九天，傷亡軍民一萬餘人，基地全毀。除滬杭鐵路以南有一部份未受此役影響外，其餘皆陸續突圍，退入太湖。

第二路自民國卅年五月進入陷區，即在無錫的顧山，江陰的祝塘、皋岸，以及武進的焦溪等地，連遭共軍何克希、譚震林、張之宜等部的攔截攻擊。激戰之下，雖然擊斃其首領何克希、夏光，擊潰共軍第六師，傷亡共軍約二千人；但忠救軍也受到很大損失。十一月五日，正當在焦溪擊退共軍的攻势以後，整補未畢；敵軍忽以一個聯隊及一個偽軍團的兵力，向焦溪發動攻擊，情勢嚴重。幸而第三路「錫武宜挺進縱队」此時正擊破共軍的重重阻撓，也到達焦溪附近，乃與二路的縱隊並肩抗敵，相互策應；結果，斃傷敵軍三百餘名，殲滅田中中隊的全部。敵軍遭此意外重創，再調集一個師團的兵力，以分進合擊的態勢，企圖「圍殲」。二、三兩路久戰損耗，亟待整補，難當其鋒，乃且戰且退，北渡長江，轉入靖江、泰興地區，繼續活動。卅一年春，又在江北與敵軍及共軍作戰，然後再南渡長江，在丹陽、金壇地區從事游擊活動。

此階段，忠救軍經過改编，以新鋭之師重入敵後，本可迫使敵軍顧此失彼，感受威脅，不敢下鄉: 可惜横遭共軍阻撓襲擊，以致削減戰力，飽受牽制，無法發揮統合戰力，幾遭全軍覆沒的危險。幸賴官兵勇敢果決，百折不回 ，始能維繫支撐，繼續發展。

1943 年,「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」成立，戴雨農先生任主任,根據雙方協議，忠義救國軍也是參加合作的單位（詳見拙著『戴雨農與中美合作所』）。爲了便於接受「中美合作所」的訓練與裝備，乃將所屬部隊改編爲四個縱隊（按正规軍步兵師編成），以及

南京、淞滬、浙東、浦東、澄錫虞等五個行動總隊。五月，馬志超任總指揮，阮清源任副總指揮（十月，由王春暉繼任），郭墨濤爲參謀長（十月，由郭履洲繼任），李穰、汪浩然、文德、鮑步超爲縱隊長（後來因第三縱隊傷亡慘重，奉准將四縱隊併入三縱隊，以鮑步超爲縱隊長）。活動的區域，也擴展到浙東。

忠義救國軍接受「中美合作所」的美式技術訓練和新的裝備，實力大增；不但士兵已經配有卡賓和湯姆生槍，而且還獲得很多新型的爆炸器材。

以爆破的手段，破壞敵人的交通和倉儲，本是忠義救國軍經常實施，用以打擊敵人的。自接受美式新訓練，獲得新器材後，實施更爲積極。茲就共與美員合作破壞浙贛鐵路的片斷，作抽樣的敍述。

民國卅三年五月，敵軍發動長衡戰役，進攻長沙；六月，駐在浙江金華一帶的十三軍，向浙贛邊境，作攻向贛南的趨勢，以爲呼應，廿六日攻陷衢州。由於我國軍的堅強抵抗，和我忠救軍在浙贛路上的襲擊，無力再進，廿七日被迫退回金華。

戴先生爲牽制此處敵軍，使其遭受困擾，無力再興攻勢，特下令忠救軍加强對浙贛鐵路沿線的破壞。九月，忠救國挑選了一支三百人的突擊隊，並有美員帕金少校等十二人參加，前往破壞諸暨附近的鐵橋，遭遇敵軍攔截，發生激戰；以致担任破壞橋樑的一組人员，無法接近目標。但另一組人員却冒險滲入目標區，在鐵道上引發十三枚炸彈，毀壞鐵軌五處，哨舍二處，忠救軍也有七人陣亡。十月，再在同一地區，會同美方教官薛格里斯上尉等美員五人。發動一次突擊，很

成功的炸毀了廿處鐵軌和橋樑。

十一月，忠救軍組成一支名爲「劫煞組」的破壞隊，專破壞鐵路附近的敵軍倉庫堆栈，美員薛格裏斯等五人參加；結果在諸暨附近縱火焚毀敵軍的堆栈，毀去約十萬加侖的汽油，還有六百箱彈藥。

當九月份第一次破壞諸暨鐵橋成績不太理想時，却有件對此後突擊大有幫助的意外事件；一位偽軍上校軍官徐某，因爲被忠救軍的火力擊傷而被俘。當他傷愈之後，決心棄暗投明，負責带來他所指揮的五百名偽軍，投降忠救軍。於是十一月間，美方教官負責浙赣路方面考察的赫爾，和忠救軍合作，在投降的偽軍中挑出一百卅一人，分爲兩批，出沒山區，到達基地一百哩以外的安華村（諸暨以南六十哩）鐵道邊，得到當地民衆和村長的響應。黑夜中埋下廿磅塑膠炸藥，装上了兩枚名叫「布奈爾说服者」的新型器材，順利的炸毀了車頭和後面的五節車箱，使敵軍蒙受一次意外的損失（日敵因爲經常受到破壞，所以研究出一種防範的方法；在每一列火車頭前面，配上兩節空檯車，如果碰到炸藥，被炸毀的將是空檯車，而不是火車頭和整個的列車。『布奈爾說服者』正是針對這種防範方法而設計的裝置，裏面有一種延時行動的裝置叫『顫動型的觸發器』，埋在鐵軌下面，事先可以預定震動的次数，然後才引起煤炸』）。

敵軍受到一連串的突擊破壞，非常焦急，於是發動了一次攜有砲火的搜索戰，想「掃蕩」這批令其寢食難安的遊擊隊；可是，經過八天的濫射窮追，仍然無法如願。竟然派出一批曾受訓練的行動人員，企圖暗殺赫爾；結果三名被捕。而突擊隊於返回基地中途，却又在开化焚毀了五座敵軍倉庫。

正當忠救軍的游擊活動日益蓬勃的時候，原已竄抵江北的共軍（新四軍殘部陳故，襲破了江蘇省韓德勤的部隊），不但不遵照中央命令北渡黃河；反而於民國卅四年一月，集結廿九個團的兵力，由粟裕率領，南渡長江，經金壇、溧水區的茅山，會合土共，竄犯浙皖邊區，企圖重回江南，別建基地，澈底消滅忠義救國軍，控制京滬杭地區。

當時，防守泗安、安吉一帶，爲國軍廿八軍；忠救軍奉三戰區長官部令佔領寧國墩、焦村、犂壁山、牛頭山、葉塢橋、瓜嶺、八掛山之線陣地，爲廿八軍的左翼，協力抗拒共軍的南竄。一日廿九日，共軍王必成、陶勇兩個縱隊，向忠救軍第二縱隊攻擊，縱隊指揮官佘萬選率部堅強抵抗，激戰廿餘日，數度逆襲。共軍未得逞，轉以全力進攻廿八軍的六十二師防地，突破後，再由右向二縱隊側後夾擊。二縱隊遂退到汪村整補。是役，忠救軍連長四人陣亡，六人負傷，排長以下官兵傷亡二百餘人，生俘共軍二百餘名，共軍留下四個埋屍千具的土坑。

二月十日，陈毅復自江北率師增援共軍，準備再興攻势。我五十二軍也奉命前來增援，當以五十二軍爲左翼，廿八軍爲右翼；忠救軍爲中央正面於二月十五日先向共軍進攻。忠救軍以第一、二兩個縱隊分向虎嶺關和牛頭山進攻，一鼓克服；但以進展神速，與左右翼隔離較遠，形成突出，遭共軍反擊，于十六日被迫後撤。幸第三縱隊自桐廬附近日夜兼程增援，與急退的友軍，固守杭杆主陣地；並以有力新銳，持犀利武器，向共軍側後夾擊，激戰至廿日拂曉，終將共軍擊退。共軍因係以人海戰術進攻，損失慘重，乃竄入天目山，喘息整補。

調整部署防共殺敵

1945 年春，日敵敗象顯露，戴雨農先生爲把握戰機，配合國軍反攻，策應美軍登陸作戰；特親臨前線，就忠義救國軍和「中美合作所」新成立的教導營，重新調整部署，先後成立淞滬區、温台區、鄞杭區三個指揮部。

淞滬區以阮清源爲指揮官，以第一縱隊的一個團爲骨幹，推進松滬地區。溫台區，設指揮部於瑞安的玉壺，以郭履洲爲指揮官，統轄中美班的三個教導營，一個特務大隊，一個獨立支隊，一個水上大隊，以及忠教軍的浦東行動總隊張爲邦部；沿浙东沿海向浦東、崇明方面活動發展。鄞杭区，設指揮部於浙江的桐廬，以鮑步超爲指揮官，統轄第三縱隊及新一團（偽軍投誠），沿桐廬、富陽之線，向杭州活動發展。其餘一（欠）、二縱隊及各行動總隊（浦東除外）、直屬营、隊，均直屬總部，並設總指揮部前進指揮所於浙江於潛的方元鋪；總指揮馬志超坐鎮前方，指揮作戰。

淞滬區指揮部向敵後挺進，因天時、地利、人和等條件的優越，民衆擁戴，地方抗日自衛團隊武力紛紛來取聯繫，接受指揮；當地偽軍也先後接洽投降，待命反正；於是聲勢大振，發展編成五個團和直屬四個營的兵力。當地小股共軍，無法立足，竄往江北。

我第三戰區長官部，以共軍一再違抗命令，專襲國軍，對抗戰陣营爲害極大；乃由駐節淳安的副長官上官雲相，指揮第廿三集團軍、蘇浙皖邊區司令部、以及忠義救國軍，驅逐盤據天目山區的共軍。是年四月，忠救軍奉命於孝豐以西佔领陣地，向東南方的天目山區防禦，阻止共軍可能向西北方向流竄，以便利正面國軍主力由南向北的攻擊。當時共軍盤據天目山區的尚有一萬五千人，由王必成統率（陳毅、栗裕已回竄蘇北），以其佔領地形要點，瞰制浙皖邊區形勢；致我國軍仰攻困難。五月十七日，忠救軍奉命在共軍側後轉守爲攻，當以第一、二縱隊作正面攻擊；而由桐廬回師的第三縱隊，以奇襲的方式，冒險秘密潛往匪側背西天目山麓舲杉樹塘，沿斷絕地攀登而上。直搗共軍腹地，攻擊指揮部，立斃二百餘人。共軍遭此奇襲，大出意外；於是秩序大亂，軍心動搖；國軍主攻部隊，乘勢猛進，終將共軍擊潰，收復天目山區。自此以後，在東南流竄的残餘共軍，對忠救軍非常畏懼，到處迴避與忠救軍接觸，始終無法建立和鞏固游擊基地。

溫台指揮部，向浙東沿海各目標区挺進。六月上旬，敵軍第六十二旅團殘部，自福州經罗源、宁德、霞浦、福鼎，向浙江邊境撤退；原盤據温州的敵軍黎岡支隊，也以主力南下瑞安、平陽，以爲接應。九日，兩部在平陽會師，共同北竄。郭履洲指揮官當即指揮部隊，運用爆破、襲擊等手段，沿途攔截追擊，不但殲敵頗衆，而且乘勢攻克温州、海門。

當五月驅逐共軍出天目山區以後，戴先生和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副主任梅樂斯將軍，蒞臨忠救軍的前進指揮所方元舖，舉行軍事會議。事爲敵軍採知，糾集一千七百餘人，以一少將級軍官指揮，突向方元舖包圍突擊。戴先生責成副總指揮王春暉，指揮總指揮部直屬部隊抵抗；一面電令回防桐廬的第三縱隊迅即趕來夾擊。敵軍攻势猛烈，志在必得；忠救軍士氣旺盛，武器精良，激戰兩晝夜。第三縱隊自一百廿里以外趕到戰場，襲擊敵軍側背，截獲其後方聯絡補給，使其窮於應付；同時，戴先生也判明敵軍指揮官的確切位置，下令組成敢死隊，乘夜突擊，一舉摧毀指揮所，擊斃少將指揮官，敵軍頓時駭竄，又遭第三縱隊追擊，損失慘重。

八月，勝利已迫眉睫，戴先生與梅樂斯約會於昌化的河樹鎮，商討運用中美合作力量，穩定戰後東南局势問題。

此項行動，又被敵軍偵知，密派曾在山東暗殺學校受訓的諜員四人，組成暗殺小組，以具有共諜雙重身份的華人爲組長，日籍二人韓籍一人爲組員，潛赴河橋偷襲戴先生與梅樂斯营帳，被當場擒獲。九日，再派卅三旅團所屬部隊二千一百餘名，先由富陽北上，然後迂迴南下，奇襲河橋。但其狡謀，被忠救軍第三縱隊發覺，急電河橋戒備。

戴先生與馬總指揮親加部署，當令第二縱隊派一加强團迎戰來犯敵軍，第四團爲預備隊；急電第三縱隊監視敵軍，跟踪夾擊。

當晚十一時半，敵軍以奇襲姿態突擊河橋，恃其人多械精，多方衝突；我營長羅相雲親率敢死隊，迎頭痛擊，拒守危橋，負傷成仁，將士死守不退，敵軍攻势頓挫。

第三縱隊適時趕到夾擊，敵軍動搖；戴先生乘機下令第四團繞道敵軍北方，包抄側擊。激戰九小時，朝陽朗照，敵軍不支潰退，死傷達四百餘人。

勝利來到，中共公開不聽中央命令，乘機擴大佔領地域；並且想聯合僞軍，佔有東南，迫使政府無法還都，當時情勢相當複雜；幸經戴先生的謀劃應付，才克制了中共的奸謀，掌握了東南的局勢，（詳見拙著戴先生與中美合作所）當時付予忠義救國軍的新任務是：

㈠ 淞滬指揮部的部隊，警戒上海近郊和浦東，防堵共軍向上海郊區滲入。

㈡ 第一、二縱隊，仍遵照第三戰區長官部的命令，防守天目山區，並監視浙西殘留共軍的活動。

㈢ 京滬行動總队，負責維護京滬鐵路線的交通，防止共軍破壞。

㈣ 滬杭行動總隊，負責維護滬杭鐵路的交通，防止共軍破壞。

㈤ 第三縱隊向富陽、杭州前進，爲「中美所」直屬第一支隊的後繼兵力，維護杭州和滬杭之間的安全。

戴先生此項部署報奉軍委會核准，並知照三戰區後，爲了避免共黨份子乘機造謠中傷，啟人誤会，乃于八月廿三日通電忠救軍全體將士：

「……諸同志應各就工作崗位，協應友軍，爱護民衆，共維地方之治安，嚴防奸匪之進襲。凡僞軍部隊，能服從中央命令，堅決拒奸匪者；本局均可查明其實力，呈准中央，給予相當名義，聯絡一氣，團結一致，監視敵軍行動，制止奸匪之活動。絕不可弱肉强食，循環報應，形成對立，自亂步驟也。萬一因給養不繼，必需向地方暫行籌備者，亦必商同地方士紳，據實際最低限度之需要，暫行借貸，絕不准脅迫勒索；如有故違，一經查明，或有民衆告發，定必嚴懲不貸。」

本文中提到忠救軍向地方暫借給養的事，這在當時，實有必不得已的苦衷。因爲，在敵後發展游擊，全靠羣衆支持；羣衆所講求的是順逆，所希望的是名義。如果僅爲敵我之爭，壁壘分明，還容易辦；但當時除了日敵以外，還有依靠日敵的僞軍，還有表面上是抗日友軍，而暗蓄敵意的共軍。因此，爭取和掌握羣衆，除了政治號召以外，必需隨時隨地接受効順，予以收編，給予番號。天下未定，事機稍縱即逝；無法每一件事都

事先呈准，每一個隊員都先有編制員額和薪餉服裝。如太刻板拘執，反而予共軍可乘之機。（共軍曾有『蔣家不要我毛家要，十萬塊錢報個到』的口號，用以爭取偽軍和地方團隊、雜牌武力。）所以，有些事，必需當機立断，先就地設法解决，然後再呈報軍委會。戴先生惟恐人多複雜，或有少数人言辭態度啟人誤會，遭人反感，所以通電警戒。

忠救軍發展到勝利前後，人多勢大；而抗戰期間歷年損耗補充，組成份子的智識程度也參差不齊；一人擾民，難免影響軍誉，何况一般人對游擊隊的看法本難分辨優劣?久戰師老，须防驕縱疲弊，何况共匪的蓄意破壞中傷?因此，戴先生對忠義救國軍的軍紀，非常重視，經常利用出巡機會，親臨戰地視察，並一再手令教諭，語重心長，赤誠感人。卅四年一月，即曾手令全軍同志說：

「志超兄並轉

本軍諸同志鈞鑒：

笠因在渝事多，致不能多赴前方，與我忠救軍全體同志見面商談，但方寸之間，無時不想念到本軍之一切也。

當此勝利在望，而吾人之工作倍形困難之時；吾人應如何上下團結，一德一心，加强組訓，整飭紀律；以求本軍力量之堅强，並與民衆密切合作，以打倒敵寇，剷除奸偽；此爲我全體同志急須切實檢討急起直追者也。故在當前情勢之下，本軍必須嚴密組織，着重訓練。在人事方面，必須注意戰功，注意其人之品德，而後注意其學識與能力。有功者必予升遷，必予獎勵；有罪者必予嚴懲，有過者必予訓戒。振作人心，鼓勵士氣。對經濟方面，在本軍今日之情形，節流重於開源，緊縮重於增加。對無用之組織，不必講求表面，必須實行緊縮；對無用之人員，應即詳行考核，切實予以裁汰。各團士兵之缺額，應多方設法補充，隨時隨地實施訓練。对全体官兵之生活，應多發給實物，力求其营养之增进。而各級幹部，尤須涓滴歸公，力行節約；並須與士兵甘苦。對眷屬隨身的官兵，應儘量裁遣；對在前方結婚之官兵，務必嚴行懲處，減少拖累，增加力量，此爲本軍當前迫不及待急須切實解決之問題。

姑息足以敗事，顧慮太多，亦足以敗事；萬希本軍各級幹部同志時刻念著 領袖在八一三之後付與各人之使命。敵寇不除，是吾人之恥；如京滬克服，不是本軍之衝鋒陷陣，首先進入者，即是吾人之失職。吾人必無以對 領袖與先烈。吾人欲達此目的，當然需要與盟友合作，當然需要運用一切力量。但吾人本身如不健強，如無力量；則合作與運用，均無補益也。

目下時機已迫，稍縱即逝；本軍實爲東南抗戰之主力。吾人應以劍及履及之精神，爭取時間，爭取勝利。

凡參加本軍工作者，吾人終要求其能盡忠職守，勇敢善戰；即一士兵一伙伕，我各級幹部，亦須隨時注意考核，據實呈報總部，總部必須一面詳行註記，一面查明獎励。至於擾民之爭，應嚴格制止，澈底調查。擅取民物者與强姦婦女者及任意拉夫者，必須查明立即軍法從事；並須廣事宣傳。本軍如不能遵此意旨，切實做到，則革命之部隊，將爲民衆必須打倒之對象矣。吾人有何力量可能達成殺敵除奸之任務乎?

全體同志休戚與共，死生與共；因關係之密切，不得不掬誠以奉告。臨穎神馳，極望我全體官兵同志努力自愛，自強不息；以達成吾人神聖抗戰之使命。」

綜上所述，忠義救國軍不但不是「聯日、不抗日」，而且是一支始終打擊日敵，愈戰愈强的勁旅；自民國卅二年接受中美合作的訓練與裝備後，已立於不敗之地，其戰鬥的性質，也已經由原來的游擊擴展爲堂堂的陣地會戰了。日敵對之，如芒刺在背，既痛恨又畏懼，必欲去之而後快，幾次調動大軍，甚至由中將級軍官指揮；甚至已經投降在即，還要偷襲以洩憤；其因爲忠救軍的牽制而感到的困擾，因爲忠救軍的戰鬥，而受到的犧牲損失，都是相當重大的。

此外，日敵卵翼汪逆成立僞政權，原想藉其在國民黨的地位聲望，號召陷區民衆，形成一股足以與重慶中央政府抗衡的力量，達到他「以華制華」的目的。可是，由於軍統局在敵後的地下組織鋤奸行動的積極，尤其是忠義救國軍始終在京滬杭地區活動號召，發生了與地下組織相互策應的作用，發生了鼓舞陷區民心士氣的作用，對猶疑徘徊的人們形成了一種嚇阻力量。所以。汪逆僞政權，始終無法形成巨大力量，更談不上與中央分庭抗禮了。

但中共的軍隊，却是專打國軍不打日敵，衹求壯大自己。在江南，尤其視忠義救國軍爲眼中釘，經常以武裝力量，對之明困暗襲，並且配合惡意的宣傳。當時潛伏在上海西南的「中美合作所」的美方情報人員詹恩上尉，見此情形感到事態嚴重，曾經向梅樂斯副主任提出報告說：

「在此地區所有効忠國家的中國部隊所進行的戰鬥，都是自衞性的。共軍很明顯的完全是侵略部隊，他們的活動，極大的搗亂了本單位的工作。」

共黨利用對日抗戰，專襲併地方團隊和力量較爲單弱的國軍，壯大自己；一面配合宣傳攻勢，顛倒黑白，眞 可謂到處逢源，無往不利。尤其在山西、山東、蘇北、河北一帶，都已經控制了廣大的地區。惟有在江南京滬杭地區和浙皖邊境，因爲遇到忠義救國軍，不但企圖失敗，而且蒙受很大損失。勝利前後，想聯絡僞軍，搶收京滬，又被戴先生運用「中美合作所」的關係和忠救軍的力量，着了先鞭；以致其陰謀無法實現。因此，痛恨忠義救國軍乃當然之事。然而事隔卅年，還要拿來作重點宣傳，並且繼續加強，那是因爲忠義救國軍的餘緒和留存的精神，一直在大陸上困擾着匪僞，至今爲烈，使其感受威脅。

抗戰時期，頗具規模的游擊部隊，除忠義救國軍以外，尚有一支「別動軍」。別動軍是由國軍各部隊挑選出來的敗死隊，本擬用爲加强對日敵佔領城市的攻擊。因爲當初的構想，是以第五縱隊的方式，身穿便衣，潛入城市之內，作爲內應的，所以又叫「便衣混城隊」。軍委會交由戴先生就軍統局同志中選派優秀幹部组成督练组，負責訓練指揮。民國卅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戴先生呈准軍委會，將便衣混城隊改編爲別動軍，編成七個縱隊（相當於加強團）。1943 年，「中美合作所」成立以後，別動軍也是參加合作的單位之一，接受美式的訓練和裝備，經常在平漢路、粵漢路，以及湖南、兩廣一帶襲擊日敵，頗著事功。

另外，在後方還有一支組織龐大的交通巡察部隊，那是屬於軍委會的交通巡察處（包含原來財政部緝私署稅警部隊）有九個總隊（相當步兵團）的兵力。也和戴先生以及軍統局有深切的關係。

抗戰勝利后，戴先生鑑於共患未已，交通安全頗爲重要；乃呈准軍委會，將忠義救國軍、別動军、交通巡察處，以及中美合作所編練的教導營，合併編爲交通員警總局，總數六萬四千四百零二人，各重要道路，設有路警，並轄十八個總隊（加強團），負責全國鐵路、公路、航路治安的維護和礦區的警衛工作。吉章簡、馬志超先後任局長、馬志超、徐志道、吳志勛、尚望、郭履洲先後任副局委。

交通警察的基本任務，爲護路護礦，裝備袛有輕便武器而無重武器，由於任務的關係，分佈全國。編訓未及一月，即因共亂加劇而提先開入駐地服勤，而擴大員警行動爲綏靖作戰，參與會戰；甚至担任大軍撤退的掩護任務。由於大部份成員，都受過戴雨農先生的精神鼓舞和感召薰陶，都具有革命主義的堅強信仰，所以組織強固，團結一致。同時，雖然袛有輕武器裝備，但大多數成員曾受過新的美式技能訓練，都配備有美式新武器；所以戰力強勁，士氣高昂，是一支精鋭的朝氣蓬勃的部隊，而且也是共軍感到最難應付和最痛恨的部隊之一。

交警與共軍作戰大小一千三百餘次，每次參加作戰的兵力，有小至一班者，最大達到六個總隊。作戰的時間，最少數小時，最多長達數月。總計傷亡失踪的官兵達十餘萬人（包括不斷補充者在內），使共軍蒙受的損失，也很嚴重。因爲篇幅的關係，難以盡述，袛就戰况慘烈關係重大的戰役，和對當時局勢所發生的影響，對國家對 領袖竭誠盡忠，所表現的奮鬥到底的精神，擇要敍述。

民國卅五年夏，共軍企圖威脅京滬，乃以陳毅率三個師自蘇北攻陷如臯，直指南通，我整編第廿六旅被圍於南通和如臯之間的白蒲，一時京滬震動。交警第七、第十一兩個總隊奉調蘇北，增援陸軍整編第十九師等部隊作戰，負責地區內主要交通線的維護。當以新銳之師，力戰向前，先解白蒲之圍，再協助友軍克復如臯，即担任城防。八月，担任如南公路（南通到如臯）的護路任務。共軍乘交警部隊分故於公路的各據點之上，針對我無重武器無有利掩護地形的弱點，于廿一日，以三師之衆，採「阻援打點」的戰法，

集中進攻丁堰、公家碼頭、林梓三個據點。我軍苦戰二日，傷亡達二千二百剩餘人，爲成軍出師以來，最先受到慘重犠牲的一役。但也使匪軍傷亡達四千人，攻勢頓挫。

在北方，八月上旬，賀龍部與土共及日軍高橋部隊約四萬人，進犯大同，連陷城郊各據點。我楚溪春部卅八師、騎五師、六師、保安總隊及挺進軍被圍困。駐防包頭交警十六總隊，奉令派第三大隊空運增援，自十七日起，至九月十七日，激戰一月；以精鋭的裝備火力，作機動使用，多方援應，乘間逆襲，力阻共軍人海攻勢；終於十七日發動果敢追擊，解大同之圍，使共軍初嚐「以大吃小」和「人海戰術」竟仍失敗的苦果，是役該大隊，傷亡官兵一百五十四人。（約爲全隊的四分之一）。大隊長朱賡颺副大隊長景震泰，均蒙 蔣總統召見；朱晉少將，升第九總隊長，景晉上校，升十三總隊長。

在東北，民國卅六年六月上旬，林彪部四個縱隊，圍攻四平街。我七十一軍攻佔該地不久，戰力未復；各地友軍，距離较遠，應援不及，情勢相當危殆。當時，交警第十三、十四總隊正集結開原，改編爲國軍一六九師（因戰力强勁，作戰有功，由東北長官呈准中央）奉命馳援。當由十四總隊鮑步超部在前，十三總隊在後，集中兵力，經貂皮屯猛攻四平東南的八棵樹和二七一高地共軍陣地。此處爲共軍最重要最堅强的陣地，工事極多，且有坑道聯絡，共軍派重兵駐守。仰攻、攻堅，當然很困難；但不攻要害則無法瓦解四平之圍。交警部隊勇赴艱鉅，逐堡突擊，逐境攻殺，血戰五天；最後以十三縱隊迂迴至敵後，兩面夾擊，卒將共軍驅逐，克服八棵樹和二七一高地，打開圍城的通路，啟導四平會戰大勝的契機。是役，傷亡官兵一千七百餘人；大隊長賈維錄、薑溢三、副大隊長徐壯傑、機槍三隊隊長周瑞等因爲負傷不退，與指揮官鮑步超同獲政府頒發勛獎。

在山東，膠東半島與遼東半岛對峙，形成渤海的門戶，爲地略的要衝。陳毅即據此以生根發展，膠濟鐵路遂成爲其破壞的主要目标。1946 年夏，中央爲打通膠濟鐵路曾調交警第一、三、五、十、十二、十五等六個總隊，由副總局長馬志超率領，開往青岛，配合國軍作戰，經數月的苦戰，達成任務；不但使膠濟路暢通無阻，而且也分隔共軍，造成區分擊滅的有利態勢。後來，局勢逆轉，交警部隊爲了維護此一鐵路的交通，付出了慘烈的代價。

1948 年一月，交警第一總隊黃錫疇部任博山的守備，二月下旬，陳匪毅以四個縱隊集中濟南四週；總隊乃奉命增防濟南。三月一日行抵淄川，淄川被圍，正在作戰；乃加入戰鬥，協同防軍，擊退共軍，旋奉命固守淄川，由專署保安司令統一指揮。當時防守淄川的另有國軍第一零二團；另在附近的腳村，爲國軍卅二師。自二日至九日，匪軍一再增援，已將周村的卅二師和淄川的一零二團擊潰。十日，突入淄川城內；該總隊在孤立無援的逆境下，奮勇抵抗，逐屋爭奪，不斷逆襲：彈盡援絕，猶各自爲戰，不稍餒屈。並且堅拒共軍的勸降，大呼：「戴先生部下沒有投降的，中美班學生沒有繳械的」，死傷達二千八百九十四人。但也吸引大量共軍，使其蒙受重大損害，而延緩了對濟南的用兵時間。

在冀東，交警部隊負責北寧鐵路的交通，開灤煤礦的安全，以及昌黎城防。爲便於統一指挥，成立支隊司令部（旅級指揮部）於昌黎，指揮第五、第八兩個總隊，迭次擊退匪軍的襲擾，確保鐵道的暢通。1948 年六月，共軍爲呼應東北的軍事行動，動員聶榮臻、李運昌部共五個縱隊，約四萬之衆，配合土共，于廿三日夜向鐵道十個車站同時進攻，迫我軍各自爲戰，無法相互援應。我戍守鐵道的第五總隊，血戰至廿四日十四時，有七個車站全軍覆沒；僅留守營、安山、朱各庄三個站及灤河大橋仍在苦撐中。湯毅生司令乃急由昌黎分兵往援；以致昌黎城兵力單弱。匪軍遽以兩個縱隊之衆，大舉攻城。因實力過於懸殊，戰至廿五日十一時，彈盡援絕，城陷，湯司令負傷被俘不屈，于四十二年六月，從容就義，官兵死傷達四千五百人，幾全軍覆沒，孤軍奮鬥爲犠牲較大的一役。

在豫中，1948 年六月中原會戰，廿八日起，陳毅以十個縱隊之衆，與我黃伯韜兵團在睢縣以北的鐵佛寺、龍王廟之線激戰；並以圍點打援的慣技，阻撓來援的第五軍於東卅裏鋪，形勢危殆。時我交警第二總駛正守備隴海鐵路的朱集和商邱，卅日，奉命除留置一個中隊於馬牧集外，其餘部隊，配以榴砲一連，戰車一排，即刻以汽車運輸，至寧陵，向睢縣攻擊，以策應黃兵團的作戰。總隊遵限出發，沿途驅散散匪，擊潰魏鳳樓部，進佔寧陵。七月一日繼續西進，擊潰共軍，進佔宋莊，楊驛舖；奉黃兵團命進攻柴砦、蔣莊，掩護兵團的側翼。二日至七日，在柴砦附近吸引共軍的第一縱隊第二師，和兩廣縱隊的主力，連日激戰，總隊以任務重要，莫不鼓舞奮發以優勢火力，猛擊共軍，故死傷共軍達數千人，總隊也傷亡官兵五百餘人。八日，奉令沿商寧公路排除障礙，掩護黃兵團東進，以迄會戰結束。總隊長張績武因功獲頒勛章，並蒙 總統召見，核以師長任用。徐州勦總及第六綏區，以總隊的實力堅强，戰績輝煌，紛紛要求將其 擴編爲旅或師。

戡亂戰爭，自東北及徐蚌會戰失敗後，大局逆轉，士無鬥志；1949 年初， 總統引退，李宗仁侈談和平，大衆解體。四月，共軍順利渡江，進攻上海。

當時，交警局長馬志超指揮集中上海的交警第二、五、六，十一、十二、十八等六個總隊，第十五總隊的第一大隊，以及上海市警第一、二總隊，編成上海市中心區守備兵團，佔領市區堅固建築物，維持治安，鎮壓暴動，策應郊區國軍作戰；如共軍突入市內，則由交警担任作戰。旋因馬局長奉令率局遷粵，乃由副局長郭履洲負責指揮。

五月中旬，共軍進犯浦東，國軍作戰不利，乃抽調防守滬南的七十五軍的三個師及所配屬的砲兵團前往增援。該軍原防守的滬南陣地，交由交警部隊接管。當時，交警第二總隊已先調赴浦東，配屬青年軍；乃以五個總隊（共十八個大隊）及一個大隊接替防務，擔任原來廿六個營陣地的守備，不但兵力單弱，而且無砲火支援。當共軍攻擊局部陣地時，尚可抽調轉用；一旦全面進攻，則處處薄弱，捉襟見肘。交警部隊受命於危難之際，毅然作積極準備。

廿一日開始，共軍以三個軍的壓倒優勢兵力，猛攻我陣地，並以密集砲火，作地毯式轟擊。我軍浴血抵抗，左支右拙，寸土力爭，前僕後繼。惟以所用美式槍枝的彈藥，上海後勤部無法供應，以致在傷亡過半的困境之下，又有彈盡援絕的情況；但仍堅守最後陣地至廿四口，儘量延遲共軍進入市區。

廿四日，浦東已陷落，吳淞告急，交警兵團奉命轉守蘇州河北岸，阻止共軍渡河，掩護國軍撤退；激戰至廿六日，伤亡慘重，仍以血肉長城，阻匪前進。共軍派代表王振寰至北火車站，向第六、第十八總隊勸降；總隊以不並存，毅然開槍，將王擊傷。戰至廿七日，完成任務，全部壯烈成仁。

當交警參加上海保衞戰時，誓與上海共存亡，所以未準備撤走的船隻，也未作撤退的計劃，傷亡達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二人。匪軍進入上海後，交警的殘存部隊，化整爲零，潛入地下，從事反共遊擊活動。

共軍攻陷上海後，繼續向南進攻，民國卅八年五月，進入福建。當地土共，乘機蠢動，破壞公路，襲擊駐軍，福建幾成孤城。幸交警第三旅（轄第一、三、八縱隊）、第四旅（轄第七、十五、十六總隊）陸續到達，在副總局長尚望指揮下，負責防守福州，民心士氣才漸趨穩定。

七月一日，奉福州綏署命令，打通福廈公路，肅清土共，確保交通安全。乃以第三旅楊遇春部負責惠安到廈門之間維護清勦的任務，該旅第八總隊楊卓夫部，立即殲滅崇武附近的土共；第四旅鮑步超部負責惠安到福州之間的維護清勦任務，該旅第七總隊翁汝棵部，曾協助國軍沈向奎部清勦永泰縣的大渡口土共老巢，保持福州與廈門之間的安全暢通。

八月初，國軍撤守福州，退守金廈。廿四日，交警部隊奉命于晉江、青陽、安海、水頭一帶節節抗敵，遲滯共軍前進，掩護國軍在金廈地區的集結與部署；八月底以前，不得撤至蓮河、馬巷以南地區。當決定採取持久作戰，自卅一日起，與進攻的共軍廿八軍激戰，反覆衝殺，肉搏力拚，使共軍寸步難前；尤以水頭、安海之戰，前逢大敵，後臨大海，而仍奮厲無前，不稍搖動。匪軍遇此強敵，殊感憤恨，曾以廣播示威：

「我軍行至安海附近，惟遇鮑部隊，異常頑固，節節向我滯阻，他們處於孤軍背海的境地，仍執迷不悟，企圖掙紮，我們必須把他們澈底掃盪得乾乾淨淨……」

此戰我傷亡五百十六人，遲滯共軍進攻廈門時間達廿餘天；使金廈國軍有充份時間，從容準備，而且也激發友軍與共軍作戰的信心。第三、四旅完成任務後，奉調廣東潮汕待命，曾協助第十二兵團清勦土共劉舉生部，並掩護十二兵團全部轉進金門；然後再參加古寧頭戰役。後來，因爲表現卓越，奉令改編第十八軍的第四十三師。

浙東方面，交警第九总隊，本來於卅八年三月駐在奉化溪口，擔任 蔣總統的警衛。後來局勢變化，上海淪陷，乃轉駐三門灣的南田。九月，奉命駐守桃花島，作登步島八十九軍的正面掩護。當以大約三個大隊的兵力，防守東西廿五華里，南北十六華里的廣大山地；交通不便，工材徵集困難，而且也無重武器掩護。以之對付共軍的猛烈砲火，人海攻勢，實有力不從心之苦。但總隊毫不氣餒，仍選擇形勢要地，作重點配備，努力殲匪，不以孤島援絕而稍却顧。自十月十八日起，力戰至廿二日，斃傷共軍達二千人；總隊除一百九十三人突圍生還外，餘一千三日餘人，全部壯烈成仁。

當卅八年五月上海保衛戰劇烈進行時，交警局在四川積極擴充整訓部隊，準備將來在大西南與共軍作另一回合的戰鬥。當成立第一旅于重慶，另編成新的第二、五、十二、十三總隊，除以新第二總隊駐巴縣外，其餘集中重慶。

十月，共軍大举入川。時， 蔣总統坐鎮重慶，該旅奉命抽調九個分隊，在廖宗澤、周迅予、唐伯岳、高淩漢指導下，掩護保密局的工作人員，破壞軍事工廠，免資共軍用。總局長馬志超，則親率十二、十三兩個縱隊的主力，駐守機場附近，擔任 總統的警衛。卅日， 總統離渝飛往成都；該旅分途向成都前進，原擬轉赴西康，參加胡宗南將軍的大軍，建立西南遊擊基地。但沿途迭遭叛軍阻撓，無法安全到達；於是乃化整爲零，分別在不同地區聯絡地方反共人士，建立遊擊基地，與共軍週旋到底。

大陸淪陷，國軍有組織的抵抗業已中止，若干意志不堅的部隊缅顏投匪，甚至爲虎作倀，助紂爲虐。不甘共軍奴役的人們，紛紛組織反共武力，以爲抵抗。留置大陸的交警部隊和保密局的地下工作人員，乃因勢利導，力爲倡率；並且與來台建立反共基地的中央政府取得連絡。一時聲勢大振，義旗所指，遍及十六省；當卅九年極盛時期，受保密局掌握指揮的游擊單位共一百卅七個，總兵力達一百卅四萬二千五百六十九人；其中經常可通電訊，並且有戰果的，有十四個單位；對中共影響最大的爲湘西的王春暉、川康的周迅予，川滇的田動雲、太湖的金家讓，都是戴雨農先生的部屬，也都是以交警部隊爲骨幹的。

王春暉本是忠義救國軍的副總指揮，大陸淪陷前，任交警第二旅旅長，指揮第十五、十七兩個總隊。駐衡陽，負責湘桂鐵路的交通維護。共軍渡江後，局勢逆轉；該旅陸續收容各方後撤的交警路警和部隊，新編五個總隊（連前共七個總隊），並設員警訓練班，積極整頓。廣州棄守後，毅然號召忠義，游擊敵後；率部入湘西，在臨武、藍山、嘉禾一帶建立反共政權與游擊基地，委派各縣縣長，策励反共志士，人槍達三萬五千。因其迭次襲擊共軍，破壞交通；使匪對雷州半島和西南用兵，受到牽制。共軍視爲心腹大患，乃於卅八年十二月，以「四野」兩個軍精兵，四面圍攻基地。王率衆奮力反擊，殲共軍極多；激戰一月，因彈盡援絕，乃化整爲零，轉入他處，繼續活動，王受重傷，自殺未果，被俘不屈；於卅九年四月八日在衡陽「公審大會」上稱：「我王春暉雖被殺，但尚有千千萬萬王春暉，決殺不盡」。旋即高呼口號，慷慨就義。

田動雲，本來是軍統局同志，曾任站長，卅八年十月，任交警滇越區警務處長，駐守滇省。大陸淪陷後，毅然率路警赴川南的慶符、珙縣一帶，建立基地，號召忠義，策動匪偽反正，達六萬七千五百之衆，分佈於川南、滇東一帶，與共軍作戰多次，聲勢浩大；曾奉 蔣總統于卅九年五月明令嘉勉，所部士氣，益爲振奮。共軍對他，有如芒刺在背；乃於是年八月，調「二野」兩個軍，大舉圍犯。當時，田部義軍士氣昂揚，但彈藥缺乏，不能局守一隅。田面臨危局，從容鎮定，亟召所部說：「漢賊不兩立，吾人必抱馬革裏屍的決心，擊敗共軍，直搗重慶，收復西南，方不負國家教養之恩」。随即親歷前線，與共軍作殊死戰，激戰月除，斃匪甚衆。惟匪一再增援，而義軍弹藥有限，犧牲也大。爲免同歸於盡，當令一部突圍，另立基地，徐圖發展；一面親率敢死隊衝入共軍陣，掩護突圍，斃共軍百餘人，終於壯烈成仁。

周迅予，本來是忠義救國軍的處長，大陸淪陷前，任瀘州警備司令，應召赴重慶指導破壞軍事設施，免資共軍用，西南陷共軍後，乃率部份交警部隊爲骨幹，號召忠義，組成川康邊區人民反共突擊軍，在松潘附近與不甘附逆的川軍副軍長傅秉勛部會合，以黑水爲基地，從事遊擊作戰；四十一年接獲政府自台灣前往空投的人員與物資補給，聲勢益振，青海、甘肅、西康一帶的回、藏同胞，紛紛響應，成立了十個遊擊縱隊，有衆四萬人；南起川西茂縣，北迄青海同德，縱長五百六十公里，東臨隴東，西達青海果洛區，橫貫四百公里，均在控制之中，建立無線電台廿三座之多。共軍驚恐難安，于同年四月起，以步騎數萬之衆。配合兩個「公安師」，並調空軍助戰，持續進犯。義軍奮勇抵抗，反覆逆襲，斃匪極多。四十二年五月，周輕裝簡從，賓士於我軍與共軍犬牙交錯地帶，指揮所部，相機突擊，不幸被共軍所乘，乃投河成仁。黑水基地雖告放棄，但所部志士，仍繼續活動於大西南一帶。四十七年，聯絡康巴民族，發動抗暴，終致引起大規模的康藏反共抗暴運動。

在江南，大陸淪陷後，原參加上海保衞戰未及撤退轉入地下的交警部隊，以及過去戴雨農的部屬，忠義救國軍的老人，組成江南人民反共突擊軍的游擊部隊，以太湖地區爲中心，活動於京滬杭一帶。由於過去忠義救國軍深入民間的深厚關係，發展極爲蓬勃；共軍雖然一再以武力、鬥爭等方法予以「掃盪」、摧毀，但始終無法根除。

戴雨農先生鼓勵同志發揮忠義精神，不僅是言教，而且也以身教，而且也主動的解除同志本身的痛苦，主動的識拔擢用各種人才，不以直諫爲侮，不以瑕疵擯棄，完全以忠義血忱和同志共處。常常藉各種機會鼓勵同志，冒險犯難，以無名英雄自甘；每發人所不發的精闢言論。當 1943 年，戴先生爲軍統局受謗頗甚，甚至謠傳戴某即將垮台的時候；他曾對同志懇切的表示：

「中國革命是否需要吾人之工作，是否由我戴某終身爲之；此非余個人所應爭持者，而一切听命 領袖。在 領袖未令余不做以前，只要一息尚存，餘必始終如一，貫澈到底，生死成敗，在所不計；祇求無愧 領袖，無愧革命，無愧國家。十載以來，吾人原無好環境；除 領袖對余之督責、訓勉、愛護、期望之外，幾無時不在反革命勢力之層層包

圍及威脅利誘中掙扎奮鬥，並求工作之發展。因此，余隻要求我同志絕對忠於領袖、忠於革命、忠於國家。古云：『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』，又云：『持其志毋暴其氣』，余嘗以頭可殺而志不可移自勉。須知吾人要在最惡劣之環境中，始可有最大成就，如無艱難困苦之磨練，即無從見盤根錯節；經不起風浪，即不能作中流砥柱；故余以爲青年人環境太好则爲壞運氣，環境壞始爲好運氣。吾人之组织乃革命團體，一切爲國家，一切听命 領袖；而非政治團體，自有其政治主张。在此前提之下，吾人獻身革命，爲求主義之實行，而非戀棧於官職；革命成功後，即做一太平百姓，亦心安理得。因此，目前最要者爲修身以進德，以求不恤天地父母所生，不負 領袖與國家之愛護與期望而已」。

1944 年十一月十二日，戴先生利用慶祝中國國民黨成立五十週年，紀念 國父誕辰的機會，勉勵同志做無名英雄，創造光榮歷史，他說：

「余读本國歷史，深感革命之可以成功，實由革命先烈之忠勇奮發，同心協力；秉承 國父意志，爲國爲民，抛頭顱洒熱血之結果。然僅憑此已知名姓之先烈仍不足寫下本黨五十年光榮歷史；而必須有廣大之無名無姓之羣衆爲革命而犧牲，始克完成。故吾人今天紀念 國父與有名有姓之先烈固屬重要，但紀念其他無名無姓之同志同胞，更具深刻意義。一部史書，乃由白紙黑字合成者，吾人在歷史所佔之地位不是黑字，而是寫黑字之白紙。此歷史必須具備之白紙，即吾 人之清白家風；而吾人即其他無名無姓而爲革命犧牲之志士。然吾人必須誓作歷史之白紙——無名英雄，一切努力，必须出發於革命之義務感，毫無個人之企求，以繼承 國父與革命先烈之遺忘，續寫今後之光荣歷史」。

戴先生以做歷史的白紙勉勵同志，並非徒托空言；他自己以身作則，從不矜伐自己的功績，從不畏避任何艱難複雜的事務，勞怨不辭，生死不渝；而以忘我爲「清白家風」之倡率，所以能蔚爲團隊的風尚，歷久彌堅！

當 1937 年倡議組織別動隊，以至後來的忠義救國軍、交警的路警和部隊，由萬人發展爲十萬之衆，一脈相承，始終在艱危的環境中與不同的强敵奮鬥；愈挫愈奮，前後已歷廿六年，莫不勇毅英發，鞠躬盡瘁，絕少動搖變節，敷衍退縮之事，甚至在大陸淪陷廿四年後的今天，仍在敵後繼續活動，奮鬥到底；其所秉持的賴以維繫的一貫的精神，就是戴先生的忠義精神，就是軍統局的「清白家風」的團隊精神。

目前，時事日艱，縷述當年往事，回憶戴先生的英姿壯志，一片忠義赤忱，影響如此深遠。而哲人已逝，不禁無限懷念，也無限感傷！同時更對忠義救國軍和交警總局的革命烈士，表示無限的崇敬。對仍在敵後艱苦奮鬥的同志，予以虔誠的祝福！

以上《戴雨農與忠義救國軍》，是 1973 年《中外雜誌》第 13 卷第 5、6 期連載內容。